



体育人文社会学

论新中国60年体育发展方式的演进与转变*

刘玉

(阜阳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41)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发展方式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建国初期单纯依靠国家投入的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化、社会化为核心的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以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进步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这3个阶段既各具特色又相互联系。通过对新中国60年体育发展方式的系统分析,探寻我国体育发展方式演进的特点、规律,为现阶段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帮助。

关键词:体育发展方式;演进;转变

文章编号:1001-747X(2012)01-0025-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80-051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w China Sports Development Mode

LIU Yu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23604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ur country sports development mode has witnessed 3 stages. They are the initial Overtake Model relying on stat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mode with the core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after th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mode of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outlook. These phases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is research, through experience of 60 years growth sports, aims systematically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sports in China. It is meant to lay bar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laws in hope that the help could be given to the current spor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mode.

Key words: sports development mode; 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体育事业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更是提出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体育经费投入、体育人口比例、人均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市场化程度、体育发展均等化程度、世界大赛中创造奖牌的效率等一系列衡量与判定体育强国的“硬实力”指标,还是体现国家体育“软实力”的一系列指标,如国民的体育意识、公众体育参与精神、体育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全体公民中对体育价值观的推广、公众体育法制观念及法制化程度、在世界体育发展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中国体育文化对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贡献度等,都与世界体育强国的要求相差很远。为解决上述我国体育发展中的问题,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嬗变,转变体育发展方式被认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1-3]。对我国60年来发展方式的演进轨迹进行研究有助

于揭示我国体育发展的本质内涵和精神实质,推动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1 建国初期单纯依靠国家投入的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

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方式表现出以下明显特点:在投入结构中,强调国家投入,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快速赶超西方发展国家水平,提高人民身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在发展的标准上,强调体育场地、设施、器材以及锻炼人数、达标人数等量的提高;在发展重点上,先以群众体育的发展为重点,后期为突出体育的政治作用,逐步以竞技体育为重点。总的看来,这种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的形成基础:一方面是打破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激情与落后的体育发展水平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是通过包括体育在

* 收稿日期:2011-06-10;修回日期:2011-08-3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TY00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38SS11046)

作者简介:刘玉(1973-),男,安徽涡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内的竞争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维。

1.1 强调国家投入和政治驱动 通过突击推进我国体育快速发展

赶超是我国建国初期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把赶超思维落到操作层面的具体办法就是用“突击”的方式实现体育发展的具体目标,即通过国家投入和政治驱动,快速发展体育场地设施、提高达标人数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国体育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国家体委到全国各地各级体委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取代了以往的社团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主要是以县级业余体校、省级体工队和国家集训队为架构的三级训练体制,以及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从实际的发展效果来看,的确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我国体育场馆、游泳池等由 110 个增加到 590 多个,全国达标的人数超过 140 万人,群众体育蓬勃开展。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突击不是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突击可以迅速完善我国的体育基础设施,有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但突击不能持续,因为连续的突击必然会打破体育发展的平衡、体育与社会其它要素发展的协调性。由于突击必然强调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和重要性,个体利益受到忽视,加上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手段,导致我国体育发展中个人激励结构的扭曲,最终形成对公众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造成我国体育发展中从宏观层面上看轰轰烈烈,但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效率却很低。所以在 1958-05,我国再次提出了“5 年内做到两场、一馆、一站、一池”“10 年内达标人数达到 1 亿 5 000 万,力争达到 2 亿人”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后,体育发展开始逐步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脱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政治驱动下,健身操被“忠字舞”和“语录操”取代,全民游泳被水中誓师游行取代,我国体育发展陷入了混乱状态^[4]。

1.2 体育的发展结构不合理 忽视综合平衡

我国的体育的发展在建国初期,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由国家各级政府投资,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实施,体育资源属于国家,其分配也是由国家各级政府决定。从表面上看,各级体育及其直属事业单位构成的系统在职能上也是社会体育服务的生产系统,与广大公众也似乎构成了体育服务的生产系统与消费系统的基本结构。但回顾建国初期体育的发展历程可知,体育的供给不是根据公众的需求决定的,消费决定市场的逻辑与计划经济体制是不符的,所以在现有的体育管理体制中及经济基础下,我国体育的发展完全依赖各级政府的计划和

财政投入,在体育资源的配置中,公众主体的需求与利益完全被忽视。我国体育发展中,需求决定供给、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基本的原则被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消费所取代。另外,在这种体育管理体制与层级式管理模式下,逐步形成了僵化的条块分割,体育资源无法自由流动,更谈不上优化组合,体育管理部门与其它部门所需的协调配合无法实现,体育产业发展缓慢。到了 1960 年以后,由于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困难,这种体育的发展结构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提出了竞技体育和城市体育为主的发展策略,体育的综合平衡完全被打破。

1.3 体育发展方式的不断调整

新中国成立以后,体育发展的战略方针、措施始终在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例如:1960 年以前,以群众体育发展为主,1960 年以后,逐步以竞技体育为发展重点;1960 年以前强调普及,1960 年以后强调“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偏重提高”。但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并不是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为了解决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其目的就是想想方设法压缩我国体育发展的时间、缩短体育发展的差距。所以,建国初期这种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事先设计的理论模式,而是一个实践过程。这就造成了 60 年代后期人为的“侧重式”的发展方式^[5],即为了实现体育事业的赶超发展,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确立发展的重点,在体育资源的分配上向重点领域倾斜,从而实现局部突破,体现社会主义体育发展成果。在具体的发展层面上,普及被提高取代,群众体育被竞技体育取代,竞技体育和城市体育发展获得了体育资源分配优势,即便在竞技体育内部也再一次确立发展重点,形成了某些项目在发展上的“单兵突进”的态势,并实现短时间内局部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方式虽然容易形成体育发展在某一方面的突破,甚至可以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但这种体育发展方式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造成了现阶段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也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体育发展方式。

1.4 把体育管理体制的架构与改造置于体育快速发展的优先地位

建国初期,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推进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层级式推进方式,在这种发展方式中,体育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缺乏自发协调机制,无法为体育的发展拓展空间。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体育在保家卫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提出了“三为”、“两化”的体育发展指导方针。应该说,通过体育的发展提升民族自信心,提升国际地位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体育毕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发展也不可能脱离经济、社会等诸多条件的约束,实际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脱离有限资源的刚性约束。但过于考虑体育的政治作用,实际上就把体育全部纳入计划经济的政府行政和财政体制之中,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体育管理体制,而体育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证明是适合自下而上发展的大众文化。从体育发展的实践过程来看,从 1953 年我国开始加快社会改造步伐,到 1956 年底适应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体育管理体制基本建立,但发展的绩效和速度不仅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体育发展中的体制原因被忽视,甚至把体育发展的诸多观念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不允许进行理论探讨,这种思维直到“文革”结束还对我国体育的发展方式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体育发展方式属于赶超型发展方式,这种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与我国成立之初通过赶超发达国家体育发展水平、奠定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初步基础的需求是一致的,针对我国人民体质急需提高的现实,以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体育发展方式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形成的,其实施也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体育发展的一系列事务进行管理,以计划手段实现对体育资源的配置,形成以各级体育局为中心的体育管理体制;以体工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在实践中导致了我国体育发展模式上的问题,行政权力在体育发展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体育发展资金结构非常单一,完全依赖政府。这种现象导致了以下问题的出现:一是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一些具体的发展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二是突出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不够,在实际的社会体育运动开展中,过多考虑了政治因素,而基层体育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三是社会体育发展中质与量脱钩,体育发展主要靠政府推动,表面看群众体育开展轰轰烈烈,但实际上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出现了片面追求竞技体育成绩的问题,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基本停滞;四是对运动员从选材、训练到比赛、退役安置均由地方政府中的体育行政部门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包揽,体育人才无法合理流动;五是农村群众体育发展陷入低谷,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同时由于政府是我国体育发展中的唯一主体,体育资源的使用被政府垄断,效率得不到保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建国初期这种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已经很难促进体育

的发展,许多重要的问题也无法通过现有体育发展方式得到协调和解决。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体育发展战略也发生了重要改变,需要构建新的体育发展方式,来带动我国体育的新发展^[6]。

2 改革开放 30 年以市场化、社会化为核心的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

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从政治上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发展成为各行各业新的主题,体育的发展也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渐受到重视。第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育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为体育领域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第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国外交往的增多,我国的发展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交流与合作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世界的主题,体育的政治作用逐渐弱化^[7]。第四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依然是落后体育生产及供给与人们体育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样,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在体育领域解放思想,加快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持续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体育发展的重点。所以总的来看,以发展为导向的体育发展方式,试图将我国体育事业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统一起来,从而有效避免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脱离的现象,所以这种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强调以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为体育的发展释放动力和提供保障。

2.1 体育的发展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比例失调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体育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不断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这一观念的更新,使我国体育发展在实现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创新空间,发达国家的经验、理论、技术等逐步被用于我国体育的发展,甚至一些先进的体育管理体制也逐步服务于我国体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体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微动力不足的问题。受此影响,我国体育发展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不再是体育发展的唯一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个人主体广泛参与到体育发展之中,并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行业体协、基层体协不断发展。虽然国家投资仍然是我国体育发展的基础,但体育社会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体育开始逐渐克服过分集中于国家的弊端。同时这一阶段,体育产业的发展开始受到重视。所

以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体育的发展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逐渐受到重视。但也应该看到 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强调的“发展”并没有突破量的范畴 其评价标准更多的是以可以量化的指标作为参考 在这种情况下 竞技体育的成绩成为干部考核和提拔的重要依据 在群众体育领域也是以场地修建、运动竞赛的举办等可以量化的发展为主 而能够促进体育可

持续发展的公众的体育意识培养、体育技能培训、体育需求等没有受到重视。从 2002—2007 年我国体育事业费支出科目一览表(见表 1)中可以清晰看出 体育竞赛、运动训练等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另外在体育发展中 过分重视效率 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 造成了我国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均衡、阶层不均衡、民族不均衡等问题 使公众无法普遍享受体育发展成果。

表 1 2002—2007 年我国体育事业费支出科目一览表

年份	体育竞赛费		优秀运动队经费		业余训练费		体育场(馆)补助费		其他事业费	
	总额/万元	比重/%	总额/万元	比重/%	总额/万元	比重/%	总额/万元	比重/%	总额/万元	比重/%
2002	101 594.9	10.88	233 617.0	25.02	79 685.4	8.53	129 399.1	13.86	389 455.0	41.71
2003	69 717.7	7.29	241 478.5	25.25	83 085.6	8.69	136 476.0	14.27	425 522.5	44.50
2004	77 349.0	7.22	271 389.0	25.33	91 797.0	8.57	156 823.0	14.64	474 119.0	44.25
2005	82 105.0	7.3	312 115.0	27.75	100 312.0	8.92	152 075.0	13.52	478 061.0	42.51
2006	134 667.0	9.93	370 200.0	27.29	106 436.0	7.84	182 308.0	13.44	563 166.0	41.51
2007	200 476.0	12.4	372 057.0	23.00	145 963.0	9.03	293 675.0	18.16	605 146.0	37.42

注:比重是指体育事业费各支出科目与体育事业费支出的比例,是根据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当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2.2 强调体育发展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协调发展

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是在体育发展中 把加快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了体制改革的层面 换句话说 这种体育发展方式不仅要改变落后的体育生产 而且要改变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科技等多方面的关系 使之适应于现代体育的发展需求。与体育发展相伴的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了改变传统体育发展方式中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把市场化引入到我国的体育发展之中。众多研究者认为建国初期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内生性”缺陷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因此不仅运转效率低下 而且公民的体育利益无法保障 这是导致体育的发展过度为政治服务的主要原因 因此希望通过体育市场化改革提高体育发展效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国家投入对体育的控制力逐渐由量的体现向控制力转变。但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 与体育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体育管理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方式也表现出明显的转轨特征:一是体育发展中量的增长依然受到较高的重视 而对质的关注不够 但强调体育的发展与结构调整并重;二是在发展层面上超越了物质层面的范围 在强调体育场地、器材等发展的同时 体育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逐步受到重视;三是在发展视野中 强调体育领域的多层次开放 为体育的发展提供经验与动力;四是在发展速度上 虽然依然强调量的增长 但基本摆脱了

跃进式的赶超发展 确立了分步式的战略方针。

2.3 体育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不十分适应 体育发展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为避免我国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离的问题再次发生 各级政府已经非常注意体育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但结果并不乐观。根据生产诱发系数计算公式 结合我国 1997、2002、2007 年投入产出表 可以建立矩阵模型 通过归因矩阵分析清晰表明 在自身的归因结果方面 体育事业从 1997 到 2002 年是 0.974 874 从 2002 到 2007 年是 0.855 004 都小于 1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对其他部门产业的归因结果近似为 0 这就说明 目前条件下 通过自身需求我国体育事业无法拉动自身的发展 体育对其它行业的发展促进作用较小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低 在发展中对其行业依赖性较高。也可以说体育事业与其它行业的融合性非常差^[8]。另外我国体育的发展基本来源于最终消费 最终需求对体育事业的产出量非常低 并且从最终消费的构成来看 是以各级政府消费为主 其比例也是在逐年提高 其诱发系数在 2002 年是 0.000 791 到了 2007 年这一数据提高到 0.001 109 同时政府所占的比例也从 2002 年的 77.79% 提高到 2007 年的 88.41%^[8]。所以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的发展主要靠消费支撑 体育需求不够 这也是我国体育不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9]。

2.4 体育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不够

科技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对于体育的发

展也是如此,无论是竞技体育领域的训练器材、训练手段,还是群众体育领域的健身指导、日常的体育管理无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当前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在社会体育领域和体育产业领域,对科技的重视还很不够。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世界知名体育品牌还非常少,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在社会体育领域,对现代管理理念的研究等还不够,对体育科学研究的投入较低^[10],无法适应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

总的看来,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更多关注人们的体育文化需求,强调了体育发展随着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梯度推进方针。当然,由于发展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初级阶段的产物,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在体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对体育发展的内涵并没能深刻把握,在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仍以竞技体育为主,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没有实现;在社会体育领域内对公众体育意识的培养,运动技能的培训等重视不够,社会体育可持续发展动力不强;虽然提出了在体育发展中要重视公平与效率,但在重视效率的前提下公平问题有所忽略,体育发展极不协调,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差距日益突出。二是体育发展中的公众参与并没有受到重视,一方面是体育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革,而另一方面忽视了体育发展机制的构造:不仅体育发展中存在行政区域的“条块”分割,基层体育组织所必须的自主权和独立性都存在明显不足,不利于横向关系的建立,体育资源的优化组合与流动都存在障碍;在体育管理机制方面仍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政体不分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体育的投入结构没有真正改观,仍然以国家投入为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一致;体育发展决策所需要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不够;实际工作中对投入效率重视不足,经常出现在短期内为实现最高目标而“牺牲”次级目标为代价的现象。三是虽然我国在 1986 年就提出体育市场化改革,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体育产业发展缓慢,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俱乐部造血功能不足,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体育市场化改革需要的中介机构和体育经纪人发展缓慢,运动员薪金与职业化脱节,体育市场的管理和运作不规范,产权、经营权等问题没有厘清,并没能为我国体育发展提供太多帮助。当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国家投入仍然是体育资金的主要来源,尤其是西部地区,超过 60% 的体育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四是地方行政部门仍然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包揽运动员的训练、比赛甚至选材、退役安置,体

育人才缺乏有机的流动,体育发展中的行政化倾向依然突出。另外,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了难以确保体育长时段的、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体育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在物质上的发展,竞技体育成绩、体育场地、器材设施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较,我国体育事业行政干预较多,体育市场化改革不够,体育发展的最终需求绝大部分依靠政府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体育事业的投入产出效益,使我国体育事业的投入和产出边际效用产生逐年递减,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不强。

3 现阶段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进步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对体育发展方式的主要影响在于:一是要不断寻求、充实体育发展的新动力,这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是要提高体育发展的质量,充分考虑我国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环境等与体育的关系;三是需要实现体育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要使体育发展的成果能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进步导向型体育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体育发展不仅要强调可持续、全面性发展,也要强调协调性发展,要能够逐步化解体育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 2007 年开始,我国各级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采取了不断加快体育管理体制、加快体育市场化进程等措施,不断推进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2011 年,更是把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列为我国体育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3.1 不断加大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推进体育发展方式转变

虽然目前我国体育的发展还是依托政府层级式的推动,以促进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政府包揽发展体育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在许多领域已开始推行管办分离,在体育资源的分配上,也逐渐打破政府的垄断,开始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这些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雪炭工程”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随着《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一些具体的法规不断细化,体育管理部门开始向社会让权、放权,体育非营利组组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开始逐步承担起我国体育发展中的许多重要职能。在竞技体育领域,职能化改革不断推进,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职业

联赛发展很快,推进了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管理部门以成立项目管理中心为契机,不断精简机构,优化人员构成,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2 不断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发展,推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

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决定着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是体育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变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下,我国体育发展城乡不均衡、阶层不均衡、民族不均衡,同时由于重竞技、轻群体,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发展不均衡,严重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体育管理部门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阶段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但是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还远没有完成,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主要采用加大体育公共服务投入、加强利益补偿的方式来缩小体育公共服务的非均衡发展。一方面通过利益补偿的实施,加快我国农村地区、中西部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通过利益补偿的方式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受益范围还非常有限,并且不具备可持续性。另外,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虽然我国体育事业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占 GDP 及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却逐年减少,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不仅发展水平较低,而且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11]。

3.3 以结构调整与科技创新为载体,推进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结构调整联系紧密,结构调整的实质就是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当前我国体育发展中的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体育的发展受到重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在坚持“举国体制”的同时,开始放弃诸多限制,职业体育发展迅速;三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受到重视,对我国体育发展的贡献逐渐加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科技在我国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重视,不仅在竞技体育领域,先进的训练器材、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人才培养机制等对我国的竞技体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群众体育领域、体育产业中,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管理经验被广泛采用,提高了我国体育发展的效率。例如:在体育产业发展中,运用梯度转移理论,提高我国体育产业在区域间的相互承接率,提高了体育产业运行的整体效率^[12]。

3.4 不断加快体育市场化进程,扩大体育需求,促进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的体育发展方式建立在不能反映市场需求的政府垄断的基础上,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国当前采取了不断加大体育市场化进程的方式。在竞技体育领域,以足球职业化改革为突破口,近几年,篮球、排球、武术等一系列的职业化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其运作、管理等行为日趋成熟;在社会体育领域,虽然政府依然是发展的主体,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化手段不断被运用,尤其是在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不断发展,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行动中,公开招标开始取代政府的垄断供给,通过一系列的市场手段,我国体育发展的效率不断提高,同时由于政府逐步把一些微观职能交由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不断加强。针对传统体育发展方式中体育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推动的问题,扩大体育需求成为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关注点,公众的体育需求、体育的市场需求等逐渐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直观地看,把体育“发展”与体育“增长”区别开来之后,似乎体育“发展”就可以不包括体育“增长”的要求了,但实则标志着对体育发展中“增长”问题的更加重视,并把“发展”的理念和要求渗透到体育“增长”之中;修正了传统体育发展中片面的“量”的“增长”体育发展观,也就是说在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中,虽然也同样重视“增长”,但不再是单纯的重视体育场地设施等量的“增长”,而是方式具有了“发展”的目标和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说,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要使“增长”和“发展”完全分离,而是把“增长”和“发展”通过多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发展”的“质”的要求和可持续性,导入体育发展的“量”的“增长”之中,使人们对体育发展的理解产生新的定位和新的目标。在发展目标上,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体育场地、设施等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不再追求量化的指标;在发展标准上,更多地考虑了制约我国体育发展内在的主要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重视;在发展途径上,将发展处于优先增长的位置;在发展重点上,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成为重点;在区域发展上,强调协调均衡发展,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推进;在发展层面上,强调加快体育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过去的体育发展方式相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体育发展方式还引入了公正的思想,公正已经成为我

国体育发展的要义,公正逐渐从潜在的积累到明显凸显,从制约因素变为我国体育发展的决定因素,从重要条件变为内在体制,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体育利益受到重视^[13]。

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少明确了 3 个方面的创新认识:第一,这一“转变”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是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具有自然转化性质的有规律运动,并客观地表现出社会转型期的阶段性特征,体育发展方式的这一转变既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也不能脱离客观阶段的内在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搞人为运动。第二,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绝不是体育领域内的单方转变,是涉及诸多变革因素的综合提高过程,是表现体育发展中的增长因素自我成长、体育发展结构有机转变、体育发展活动内生机制成熟、体育发展的有效投入、可持续积累的结果。第三,决定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的诸多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论是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等始终处于相互依存、交叉渗透的作用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既受制于经济体制、文化模式的影响,也同时受到诸多自然因素之间的作用,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体育自然发展与我国政治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交互影响。尤其是体育发展定位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后,体育发展方式现实中的“转变”直接包括对体育发展动力选择、体育投资结构优化、体育发展要素现代化提升的内涵,体育发展方式的选择更要突出体育和谐发展、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要求,所以,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成为我国体育领域全方位、整体性战略任务。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对传统体育发展理念缺陷的直接校正,形成对体育现代化变革过程认识视野的有效扩展,又是对体育发展方式实践战略指向的有效调整,从而把体育发展的变革引进到一个更有影响深度、更具广阔性、更包含历史远见的变革领域。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都是体育现代化战略的重大突破和重要升华。所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体育发展方式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目前体育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非常适合我国目前体育发展的需要。

4 结 语

无论是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对体育发展中量的

赶超的强调,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对通过改革促进体育快速发展的强调,都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对我国体育发展的诉求。现阶段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更加注重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即人的发展;体育发展不仅要强调可持续、全面性发展,也要强调协调性发展,要能够逐步化解体育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传统体育发展方式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体育现代化战略的重大突破和重要升华;但是由于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深入,政治体制改革远没有完成,而体育发展的现状又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国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且不可急于求成。

参考文献:

- [1]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24.
- [2] 李力研. 解读体育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
- [3] 刘森林. 发展哲学引论[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3-6.
- [4] 田雨普. 新中国 60 年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的回顾与思考[J]. 体育科学, 2010, 30(1): 3-9, 50.
- [5] 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 6-11.
- [6] 谭华. 关于实现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J]. 体育学刊, 2000, 7(5): 13.
- [7] 熊文. 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蕴[J]. 中国体育科技, 2005, 41(4): 14-16.
- [8] 赵道静. 我国体育事业投入的产业关联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44(1): 46-49.
- [9] 潘磊. 最终需求对我国体育事业演进影响的实证分析[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5(6): 80-82.
- [10] 李丽, 张林. 体育事业公共财政支出研究[J]. 体育科学, 2010, 30(12): 22-283.
- [11] 王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东西部体育发展比较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0, 15(3): 1-5.
- [12] 陈玉忠.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的演进与未来走向[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2(4): 26-32.
- [13] 郭卫, 黄炜.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发展走向的社会学分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5(3): 37-41.